

村上春树短篇小说中的中国想象

□ 马阳杨



冷
眼

37

“我是在神户长大的。神户华侨非常多。班上有很多华侨子女。就是说，从小我身上就有中国因素进来。父亲还是大学生的时候短时间去过中国，时常对我讲起中国。在这个意义上，是很有缘分的。”这是日本作家村上春树 2003 年 1 月在接受林少华先生的采访时袒露的一段成长轨迹。另据荷兰学者伊安·

布鲁玛为《纽约客》撰写的人物稿所载：“战前，（村上春树的）父亲是京都大学一位很有资质的大学生；后来被征召入伍，去中国作战。有一次，在村上春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听父亲讲过某件在中国的经历，深深为之震惊。他已经忘了具体是什么事了……但他清楚地记得那种可怕的痛苦感觉。”在回顾

那段凝重的历史时，身背“侵华日军后裔”这样一个尴尬头衔的村上表现出了可贵的诚意——作为一名读者，“当我在书中读到日军在中国的暴行时，我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作为一个日本人，“那是如此愚蠢，如此荒谬和丧心病狂。那是我父辈和祖辈的罪行。我想知道到底是什么驱使他们干出这样的事：屠戮成千上万的平民”；作为全人类的一分子，“我试图去理解，却怎么也做不到”。

个体的家族记忆与国族的历史负荷纠缠结绕，将村上投进一张被负情绪点染的大网。自处女作《且听风吟》始，中国元素就在村上的作品中或轻或重地扮演着微妙复杂、难以割弃的角色。1980年，村上发表了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耐人寻味的是，篇名便直接出现了“中国”——《去中国的小船》（以下简称《去》），从《且听风吟》中身份错位、宛如隐者的杰，到对“中国”的整体提取，书写生涯伊始，村上便将中国记在了他那本神秘的词汇簿上。

小说的题目——《去中国的小船》，开启了村上神秘而优雅的命名策略，它满含着一种剪除繁冗与累赘之后清新利落的历史感，对成长于战后的新一代日本人而言，它意味着征服之梦破碎后深沉的惆怅与不舍的留恋，而在西方读者的眼中，它毫无疑问散发着东方主义的风情，红色中国虽曾被革命的风暴席卷，但他们依然愿意相信低垂的帘幕后美人依旧。中国自身的失落与彷徨使其再难成为东亚的领袖，然而文化母体源

自历史纵深的辐射力仍绵延至今。日本的心早已漂向了大西洋，他们黄色的脸庞却永远诉说着久远的记忆。村上悄悄地放下了一条小船，它顺着轻缓的洋流西去，中国虽近，却总有浪儿打湿船头，使它偏离航向，离岸咫尺，却靠不了岸。

《去》由三个在时间上有着承续关系但各自独立成篇的故事组成。开篇之前，村上引用了一首旧时歌谣作为题记：“很想让你坐上，去中国的小船，只坐你我两人，船儿永借不还……”中国之近，大抵可用一艘小船的航程来衡量，可惜慢船终究势单力薄，唯有永久的租借始能接近那神秘丰饶的大陆。欲近而不得，此中的无奈与惆怅自不待言。小说以自问句式起头，值得注意的是，村上在短短四行内将其重复了两遍——“遇上第一个中国人是什么时候呢？”

叙事者尝试着飞跃记忆的窄门，从那朦胧晦暗处寻获一丝光亮，可“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〇年对于我就像是穿同样奇装异服的双胞胎”。现代性最为憎恨的便是差异，单调与同质才能维持整齐划一的秩序感。文明及其许诺给我们的安稳、舒适与便捷并非是通过平等的交易转渡给我们——自我的存在感被剥夺，正名与定位变得异常艰难，以至于“我”只记得“那是约翰逊和帕特森争夺重量级拳击桂冠那年”。于是，“我”骑车来到图书馆试图通过查阅历年新闻年鉴中的体育分目来确认遇上第一个中国人的年份。

入馆前，“我”在图书馆旁的鸡舍边上抽起了烟，烟灰燃尽的瞬间，对于“我”、对于村上春树的小说世界都异常重要的一刻降临了——“我身上毫无疑问有了什么变化发生……我在鸡舍前又吸了支烟，然后跨上自行车告别图书馆和鸡舍”。我将此命名为“突变的瞬间”，回顾村上的创作历程，这是一种他非常中意且运用相当娴熟的叙事手法。它打破了日常生活的恒久性，以相对静止抵消了世俗生活在遭遇抵抗时迸发出的强大的惯性力量。简言之，“我”是在意识的岔道口而非现实力量的刺激之下选择了转轨，显然，村上相信这种难以名状的诗意力量有助于保持生活的温润与多样，以抵御那一成不变的干燥与沉闷。某种程度上，它亦可被视为一个有关中国的隐喻。虽然对于相当一部分日本国民而言，中国不再是能够唤起认同感的轴心体，但它仍像一座废弃的核电站，时时挑动着他们紧张的神经。中国，不啻是一种“日常性”的存在，以吸烟这样一种不无轻慢的中性行为来中断由它而起的焦虑与躁动，其间的反讽竟有苦涩的滋味。

村上的确将类似的瞬间视为神迹似的生命烙印，在小学时代那青涩的印版上，“我”刻下了两件事，其一有关中国人，“另一件是某年夏天一个下午进行的棒球比赛……我在开足马力追逐越过中场的飞球时猛地迎头撞在了篮球架子上”。“不要紧，拍掉灰还可以吃”——又是一句轻松诙谐、带着特有的村上式禅意的妙语，它无头无尾，来去无踪，

却似乎在“我”脑中投下了核子炸弹——“我把这句话定格在脑海里，开始考虑我这个人的存在和我这个人必须走下去的路，考虑这种思考必然到达的一点——死。至少对我来说，考虑死是非常不着边际的作业。不知何故，死使我想起中国人”。第一部分至此戛然而止，我们很难对此无动于衷。既然考虑死是不着边际的，那么为何在这散漫的“思之旅”中，“我”唯独记起了中国人？这是隐藏在民族心理中的集体无意识，还是“我”的自由联想受到了私人记忆的干扰，抑或是村上有意为之的唐突？我们无法揣摩村上的意图，但他并非没有机会来避开这个令人颤栗的黑暗意象，村上最终选择在情绪的低压中开始他的中国物语。

“我之所以到位于港街的高地上那所为中国人子弟办的小学……是因为我参加的一场模拟考试的考场设在那里。”村上不愧是讲故事的个中高手，他为叙事者设置了一个伪装的答疑者的身份，在虚拟的双向互动中拉近了与读者的距离，也驱走了萦绕在字里行间的阴霾。据“我”猜测，“我”之奔赴中国人小学考试，缘起某种事务性差错，换言之，在一个因循守旧、秩序井然的世界里，“我”本应与其他同学一样就近考试。中国人小学是个低调的所在，默默无闻，仅有的探得的关于它的一鳞半爪的信息便是它与学校有30分钟电车之距。在仍为孩童的“我”之观念中，“那里实际上无异于天涯海角”。我们很难相信不谙世事的稚童会产生如此世故

沧桑且不免带点绝望意味的念头，恐怕这并非“真实自我”原汁原味的念想，而是“叙事自我”或者村上本人在擦拭蒙尘的记忆时由衷的叹息。因此，“天涯海角的中国人小学”，与其说是基于地理方位的慨叹，不如说是久远的回忆与“我”之间相隔的那千山万水，不用说，中国正静默地伫立在“我”生命天平的那一端，推送着无言的惆怅。

考试那天，“我”怀着黯淡的心情坐上电车赶赴中国人小学，在留心辨识目的地前，“我”便知晓了其准确所在，因为“很陡的坡路上几十几百个小学生排着队朝同一方向行进”，在“我”眼里，“他们只是默默走路，没有人往地上拍皮球，没有人扯低年级同学的帽子”，隐现在“我”脑中是“某种不均衡的永久性运动”。这真是耐人寻味的一幕，本该是朝气蓬勃、叽喳声不断的孩子，却面目模糊、肃然无声，作为战胜者的后代，他们寄居在前殖民者的土地上，身份尴尬微妙。中国人及其周边的一切，只有在其“中国性”尽可能地被淡化时，才能赢得战后日本主流社会的信任，即便是天真的孩童也不能例外。修宪后的日本，试图用一种对他族的同质化想象来补偿安全感的缺失。作为胜利者的中国族裔经受着“荣耀享受者——迁徙者”的双重身份转换，而谨小慎微与有意识地去中国化也是流散群体面对前殖民者的傲慢与有色眼镜时无奈的自我保护之举。

请允许我提醒您务必关注村上春树在《去》中为数个中国人及其作为一个

群体时所作的素描。在中国人小学的教室里，“我”等来了本场考试的监考官，他“看样子不超过四十岁，左腿有一点点跛，在地板上抬腿不大利索”，以村上对中国的善意，恐怕他无意以此外观上远非完美的角色来影射 20 世纪 60 年代的中国。一个能击碎 20 年光阴的隔膜仍栩栩如生的人物，其生理上有异于常人之处想来也并不突兀。

这位“身穿浅灰色西装白衬衫，打一条转眼即可忘掉色调花纹的很难留下印象的领带”的监考官，以一种反讽强度罕见的方式使“我”晓得了他是一个中国人，并铭刻至今——“根本看不出他是中国人”。在并不冗长的讲演中，监考官首先将中日形容为应当和睦相处的邻居，双方建立起基于相似之处的信任后应当以沟通的方式来调和不相似之处，虽然沟通有时不免受阻，但互相尊敬无疑应是重要的环节。切口虽大，但监考官的着眼点却极为细微务实——必要的礼仪与规范，他委婉地告诫座中的日本孩子们“大家也不要往桌面上乱写乱画，不要往椅子上粘口香糖，不要在桌子里面乱来”，在一长串令人略感不安的沉默之后，39 个学生答之以“明白了”，唯独“我”连口都没有张开。这是饶富意味的一幕，来自战争受害国度之监考官，既没有摆出指陈与追诉战争往事的姿态，也并未以一个“准日本人”的角色来检讨或反省历史，相反，他选择从第三方的立场出发，技巧性地绕开历史，着力强调一整套繁文缛节的重要性。战后为数众多的日本人刻

意淡忘并未远逝的历史，他们希冀通过维护既有的内生性规范以重塑年轻一代对本民族文明体系的信心，监考官的迂回教谕在某种程度上正是试图迎合这令人堪忧的现状。

小说的第三部分也就是第二个故事的开端，村上延续了他对中国人的无差别化处理，“高中位于港街，于是我周围有了不少中国人。虽说是中国人，也并非跟我们有什么不同，并非他们具有共同特征”，而这一次村上采取了更为高明的方式来为看似自愿的同化声辩——超越民族性之上的个体特性：“他们每一个人之间固然千差万别，但这一点无论我们还是他们都完全一样。我常常想，人的个体特性之奇妙，真是超越任何范畴任何概论。”这是一次含义深远的奇妙反转，村上为群体的均质类同捕获了普适性的存在空间，族群身份标志的褪色恰恰肇因于个体意识的觉醒，村上完成了事关“集体”之话语的祛魅，在村上的心目中，个体唯有挣脱他身系其中的族群的牢笼，方能获得解放，作为个人主义者的村上，恰如黑古一夫教授所形容的，“……与他把‘中国人’作为同样的人来平等对待的态度是有相通之处的。一视同仁地与‘世界’保持等距离的生活方式，足以证明‘民主主义——个人主义’的思想已深深扎根于村上春树的内心”。

舞台转到东京，故事的女主角，我所遇到的第二个中国人——在文京区一家小出版社的仓库与“我”一同打工的华裔女大学生现身，她沉默寡言，村上

则一如之前，赋予她一段平淡的描写，“她十九，和我同岁，个子不高，换个角度，说长得漂亮也并非不可”，在她身上，你已难寻中国的印迹，“虽说是中国人，但她生在日本，大陆香港台湾一次也没去过，中国话几乎不会，英语呱呱叫”。生活的况味总在不经意间被挖掘，“我”在短暂的共事中，发现女孩干活热心异常，“……而她的热心则大约属于迫近人之存在的根本那一种类。很难表达确切，总之她的热心里有一种奇妙的紧迫感……所以，大多数人都跟不上她的工作节拍，中途气恼起来。”热心的中国女孩，她希冀用速度和节奏来达致内心的平衡，只有当步调与这有条不紊的世界相吻合时，她才能获得一种安全感。而一旦生活的流水线受阻于某颗小螺丝钉的松动不得不停摆片刻，恐慌便会弥漫她的内心，例如只因一时马虎而使仓库作业顺序出现稍许混乱，她便“约有30分钟陷入一种精神危机”。她不再是具有何等中国韵味的边缘一族，而是一位很难与日本同龄人区分开来的都市女孩。

出版社兼职结束的那夜，“我”邀她一同跳舞喝酒，全然放松之后的筋疲力尽让彼此都极为享受。送她上电车之际，“我”鼓足勇气请她在迪斯科舞厅火柴盒的背面留下号码。她道别登车，其形象却辗转于“我”的脑海，怅然若失间，“我”恍悟到自己阴差阳错将她送上了相反方向的山手线。约莫50分钟后，“我”等来了神情微妙的她，然而，“我”相当诚恳的道歉与解释都无

济于事，她固执地认为这差错源于她一直以来的无趣，“和我在一起根本没意思”，她噙着泪水自述：“求你，扔开我别管。一开始我就觉得好像不对头，心想算了，就一直在相反方向的电车上坐着没动。但过东京站，一下子没了气力。一切都让我感到厌倦，再也不想落到这个地步。”日复一日继而厌倦继而迷茫继而绝望，这是典型的都市现代性症候，既然虚无的海洋足以淹没生命的律动，村上便借女孩之口完成了以她为代表的不再有中国痕迹的华裔的自我否定——“这里终究不是我应在的场所，这里没有我的位置”。夜幕深沉，怅惘的“我”犯下了第二个致命的错误——“我竟把写有她电话号码的火柴盒连同空烟盒一起扔掉了”，之后“我”找得极为辛苦，也四处打听她的下落，可终究“那以后我再没见到她”。纷乱错综的世界上，年轻的心在哭泣。在现代性的迷墙前，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生活被碾为齑粉，我们丰盈的生命之水被抽干，灵魂在生产、消费等无休止的价值循环过程中被挤压、榨取为飘浮的空壳。个人主义者的村上否定了以集体话语作为其意识形态生产内核的极权主义成为某种“超越现代性”途径的可能性，但他也绝不甘于沦为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的同路人。我们愿意相信，这两次失误皆为无心之举，但村上恐怕正是希望借助这样的“无意识”或者“天意”来表现他对那些褪去国族外衣后，无所顾忌地奔向现代浪潮的人群的难以苟同。或许，通过对中国女孩的生

活施以小小的惩戒，村上正试图唤起她的族群认同，以积存生命的能量，重获生活的在场感。

第三个中国人尚未登场前，村上即有简单的交代，之于“我”，他是那类熟悉的陌生人，曾是高中时代朋友的朋友。重逢是在一个阴冷的午后，当他道出“我”的名字时，换回的却是愕然，于他，我的记忆中仅有大块的空白，“对方面孔没有印象，年龄与我相仿，身上一件藏青色轻便西服，配一条颜色谐调、规规整整的领带，一副精明能干的派头。不过，哪一样都给人以多少磨损了的感觉。倒不是说衣服旧了或人显得疲劳，单单磨损而已”。相比监考官，他所着西服的藏青色、领带的齐整，都留给“我”深刻得多的印象。对话持续推进，“我”潜藏在深处的记忆也开始蠕动，当他透露自己现时的行当是向中国人推销百科事典时，“咣”地一声，往日的印象碎片复原了，“……不过是朋友的朋友那种程度的交往而已。但依我的记忆，他并非干百科事典推销员的那个类型。教养不差，成绩也应在我之上，在女孩子里想来也有人缘”。精明能干的中国人，投身于节拍紧凑的商业社会，虽然他没有提及，但我们不难揣度特殊的身份或许会带给他的惶惑，他的自我外化为“异己之物”，竟至于“自己现在也闹不清，到底是因为什么才落到沿街向中国人推销百科事典这个地步的”，敏感的心性渐至于迟钝愚鲁，在善于捕捉感性体征的“我”的视域里，这便是“磨损”，资本便是借助此

种物化的力量来奴役鲜活的灵魂，而作为日本社会的局外人，异乡客的标签将他逼回了中国人的狭仄生活圈，当自主与独立再难保全时，族群内部恒有的情谊与温暖将显得难能可贵，那类似原始氏族社会的人际保护网是所有落魄者的安身之所。此时，“中国”所蕴涵的感召力不言自明，心乡何处是，中国人在哪里，哪里便是中国。

战后，旅日华人因其寄人篱下的敏感身份而将族裔背景视作禁忌图腾，他们竭力去除那些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凝视与疑虑的身份负荷，在一个历史的边角被删削殆尽的真空世界里，他们谨慎地防范前殖民者残存的敌意，如上文所述，村上对此予以了有所保留的同情式理解。

随着日本经济的腾飞与历史伤口的愈合，资本逐渐取代民族、革命、解放等话语成为最具魅惑性的支配力量，它席卷整个西方世界，俨然成为无可置疑的格局主导者。作为彻底的个人主义者，村上固然对自诩天然正义的集体话语高度警惕，但人类的普遍处境不能不引起他的兴趣与思考。20世纪60年代末期，与其说族群身份的消融是刻意回避下的人为脱落，不如说这是以资本为驱力的一体化进程中的自然现象。在现代性能量过度释放的都市里，身无所系、无所依傍的个体必然将体会到渗透于空气中的孤独与虚无，而族群身份的隐退与失效大大加速了这一群体的扩张，厕身其间的随波逐流者们渺小、麻木、孤独、无助，审判这些被时代裹挟

的受害者无疑是对道德制高点的窃据，然而，村上还是通过几场无意识的梦魇温和地羞辱或者说惩罚了他们中间的代表——中国女孩，当然，村上借此抗议的正是族群以及与之相关的一整套话语系统和行为模式的式微，他通过充沛的象征力量表达了拒绝成为同谋的立场。

面对扑面而来、足以令人窒息的商业化浪潮，终有人选择了回归。与村上及“我”同一代的旅日华人在披荆斩棘、屡经变故后，其变形的灵魂已再难契合于自身的躯壳，在绝对真理与绝对价值已被宣告不复存在后，他们随时可能蹈入虚无之境。族群继而成为他们身之所倚、心之所系的救赎之物，村上通过“我”的一次不易被察觉的选择，含蓄地表现出他对这一“退步”的褒扬。

在村上春树的记忆之宫里，中国是奏响他生命之音的琴弦中最悠远的那一根。他以作家的普世情怀叙写了战后旅日华人百感交集的异乡心绪，也以极大的同情记录了他们蜗身于自我与族群之间的焦灼、彷徨。村上以作家的感性直觉到族群并非永无风暴的港湾，但在他人即地狱的世界里，我们无不受到无觅归处的困扰。通过对数个世代的中国人之族群意识的状况再现，村上浓缩了时代的背影，将一个世纪中国的愁风苦雨细细地滴入时间的沙漏，“遥想中国街市灿烂生辉的屋顶，遥想那绿接天际的草原”。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 张娟)